

语用翻译学的理论演进与实践应用： 关联、言语行为与顺应论视角

李佳暄, 王玉霞, 赵凤宇

河北大学外国语学院, 河北 保定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21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1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13日

摘 要

本文从语用学视角探讨翻译的本质与实践,指出翻译不仅是语言符号的转换,更是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传统翻译研究多聚焦于语言形式的静态对比,而忽视了语境对意义理解与传递的关键作用。语用学为翻译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持,强调译者需在理解原文交际意图与语境的基础上,采取灵活策略实现功能对等。文章系统梳理了语用翻译学的起源与发展,重点分析了言语行为理论、关联理论和顺应论在翻译中的应用,并结合广告语与公示语的具体案例,阐明语用翻译在实际交际中的价值与指导意义。

关键词

语用学, 翻译学, 语用翻译

Theoretical Evolution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Pragmatic Translation Studies: Perspectives from Relevance Theory, Speech Act Theory, and Adaptation Theory

Jiaxuan Li, Yuxia Wang, Fengyu Zhao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Received: May 21, 2026; accepted: July 1, 2026; published: July 13, 2026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nature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from a pragmatic perspective, arguing

文章引用: 李佳暄, 王玉霞, 赵凤宇. 语用翻译学的理论演进与实践应用: 关联、言语行为与顺应论视角[J]. 现代语言学, 2026, 14(7): 223-229. DOI: 10.12677/ml.2026.147639

that translation is not merely a conversion of linguistic signs, but rather a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ve act.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studies often focus on static comparisons of linguistic forms, overlooking the crucial role of context in meaning comprehension and transmission. Pragmatics provides important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emphasizing that translators must understand the communicative intent and context of the source text and adopt flexible strategies to achieve functional equivalence. The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pragmatic translation, with a focus on the application of speech act theory, relevance theory, and adaptation theory in translation. Using concrete examples from advertising slogans and public signs, it illustrates the value and guiding significance of pragmatic translation in actual communication.

Keywords

Pragmatics, Translation, Pragmatic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翻译并非简单的符号转换或文本间的机械对应，本质上是一种复杂而深刻的跨文化交际行为。传统译学往往集中于语言层面的静态比较，强调词汇、句法和文体上的忠实再现。然而，在实践中，一个在字面上完全准确的译文，为什么在目标语读者读起来却显得生硬、怪异，甚至完全误解了原文的意图。例如，将英语的问候语“How are you?”直译为“你是怎么样的？”，虽然字字对应，但完全丧失了寒暄的社交功能，导致中文读者感到费解。问题的根源在于，语言的意义并非完全由符号系统本身所决定，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被使用的具体环境，即语境。语境包括说话的时间、地点、参与者的身份、文化背景以及共享的知识等。同一句话，在不同的语境下，可能表达出截然不同的含义。

语用学的兴起，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工具。语用学是研究语言使用与理解的学问，既研究发话人利用语言和外部语境表达意义的过程，也研究听话人对发话人说出的话语的解码和推理过程[1]。将语用学视角引入翻译研究，翻译不再仅仅是翻译“说了什么”，更是要翻译“对谁说”“在什么情况下说”以及“说了想达到什么效果”。由此，“语用翻译”的概念应运而生。它是指译者以语用学理论为指导，在理解原文语境和交际意图的基础上，选择恰当的策略和语言形式，使读者的头脑中显现的形象和产生的联想都尽可能接近原作在原文读者中产生的效果[2]，最终成功实现跨文化交际。本文首先梳理语用翻译学的来源和发展，然后分别以言语行为理论、关联理论及顺应论为框架探究翻译实践。结合广告语和公示语中的具体应用，阐释其价值，为语用翻译研究提供参考。

2. 语用翻译学的来源和发展

翻译研究关注文本和书面语言，而语用研究更重视言语交际过程及其动态特征。语用学与翻译学的结合便成了语用翻译，一种运用语用学理论去解决翻译实践中的理解和产出问题的等效翻译观[3]。语用翻译学的形成与发展，源于语用学理论不断完善及其与翻译研究日益深入的融合。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一批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学者将语用学的核心概念和方法系统性地引入到翻译研究中，从不同角度推动了语用翻译学理论框架的建立与拓展，使其逐步成为一个具有强大解释力的交叉研究领域。

西方最早把语用学的观点引入翻译研究的是 Hatim 和 Mason [4]。他们认为翻译动机与社会文化背景密不可分[5]，翻译是在一定社会情境下发生的交际过程；它是涉及到文本产出者与接受者之间协商意义的一个动态过程，从预期的目的语文本可以追溯译者如何进行译文语言决策的，创新性地运用言语行为理论、真诚条件、合作原则等语用学核心概念作为分析工具，用以探讨翻译实践中的各类问题。译者站在动态交际过程的中心，充当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之间的协调者；一方面，译者努力克服传达原文意义时遇到的交流障碍。另一方面，译者作为原语文本的“特权”读者，他阅读原文是为了产出译文文本，解码原文是为了重新编码译文[6]。译者须超越字面含义，深入理解原文在具体语境中的交际目的与语用功能，并通过灵活策略在译文中重构该功能，从而实现真正的“交际对等”。他们的研究为语用翻译学奠定了系统的方法论基础，使其发展成为一门具有严谨体系的学科。

几乎在同一时期，学者 Ernst-August Gutt 直接运用斯珀伯与威尔逊的关联理论，提出了“关联翻译理论”。在其著作《翻译与关联：认知与语境》中，他提到了语境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是听众对世界的假设的子集[7]，并将翻译看作一个涉及大脑机制的推理过程，一个对原语进行阐释的明示-推理活动，一种语言交际行为，一个寻找关联链和最佳关联的认知过程。翻译的全过程实际上是两个明示-推理过程，译者的责任是在具体的语境下和不同的读者的情况下传达出原语作者的预设和意图，努力做到使原文作者的意图与译文读者的期盼相吻合。格特还首次提出了“直接翻译”与“间接翻译”的概念。直接翻译意在保留原文保持“语言特征的相似性”；间接翻译则保留“认知效果的相似性”[8]。

此外，学者 Leo Hickey 主编的《语用学与翻译》也在语用翻译学发展中影响深远。该书汇集多位学者成果，从多方面探讨了语用学对翻译实践的制约与影响，如合作原则与文学翻译、言语行为的各种语境和方式、语义前提和语用前提、礼貌原则、关联原则、新信息与旧信息、前提与指示、时间指示与空间提示、模糊限制语、话语连接词等制约翻译的因素[9]，重点分析了文化差异对语用意义传递的影响，尤其聚焦如“礼貌”等具体现象在翻译中的处理方式。Leo Hickey 等人主张，真正成功的翻译应忠实传递原文的语用意义，而这要求译者具备双文化能力，能敏锐识别并化解因文化差异引发的语用失误，使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能够感同身受[10]。他们的研究拓宽了语用翻译学的理论视野，增强了该理论对翻译中文化维度的解释力。

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国内语用翻译研究的整体态势发生了显著变化。方荣杰、李雯(2023)基于 CNKI 17 种核心期刊(1988~2020 年)的文献计量分析表明，语用翻译研究已从 2001~2011 年的“快速发展期”进入 2012 年后的“稳定发展期”，年度发文量增幅有所放缓。该研究同时指出，当前研究存在两大结构性特征：一是研究热点高度集中于关联理论(频次 21，中心度 0.49)，呈现“一家独大”的格局；二是研究方法以人文主义的文本分析为主(209 篇)，而实证研究(调查法、语料库法、实验法合计仅 11 篇)较为薄弱。这一诊断揭示了语用翻译学未来发展的两个重要方向：在理论层面，需拓展顺应论、模因论等非关联理论的应用空间；在方法论层面，亟需引入语料库、实证研究等多元路径，以增强学科的科学性与解释力[11]。

3. 国内外语用翻译的研究

3.1. 言语行为理论与翻译

言语行为理论由英国哲学家奥斯汀提出，后经塞尔完善。该理论的核心主张在于人们说话不仅是在描述事态，更是在完成某种行为，例如承诺、请求、道歉或命令等。塞尔将言语行为划分为三类：言内行为，即说出有意义语句的动作；言外行为，即体现说话人真实意图的行为，如命令或承诺；言后行为，指话语对听者产生的实际效果，如被说服或受触动。在翻译过程中，实现言内行为的对应较为容易，而准确传递言外行为才是关键。译者的核心任务是发掘原文的言外之力以明晰或隐晦的方法把这种“弦外之

音”传递给读者。这意味着有时必须舍弃字面对等。

例如,中文警示语“小心地滑”,其言外行为是“提醒”或“警告”,旨在防止滑倒。若直译成“Carefully slide”,则完全扭曲原意,甚至可能带来误导。恰当的做法是采用英语惯用的警示表达,如“Caution: Wet Floor”,以有效传递警告意图。又如,中文客套话“您慢走”,并非字面意义上的慢行,而是表达礼貌告别。若直译成“Walk slowly”,容易造成困惑。译为“Take care!”或“See you!”,虽字面不同,却准确传递了告别与祝愿的语用功能,实现了真正的功能对等。因此,言语行为理论要求译者成为“意图的侦探”,穿透语言形式捕捉功能本质,并在译文中成功重构这一功能。

言语行为理论对具体语言构式的翻译同样具有重要的分析价值。以《红楼梦》《西游记》中的“半A半B”构式(如“半推半就”“半信半疑”)为研究对象,基于汉英平行语料库的44个语例,揭示了该构式在翻译中的四种典型情形:汉英相同时可直译、汉英相似时可直译或意译、汉英较异或迥异时则需意译。研究发现,译者在处理此类构式时,其核心任务并非机械传递“半”的字面意义,而是在“语义性”与“语用性”之间做出权衡。当字面对等可能损害言外之力的传递时,宁可牺牲形式上的“半”也要保全交际意图。这一结论与言语行为理论“言外之力优先于言内行为”的主张高度一致,同时也说明对特定构式的语用翻译分析,需要从零星的例证式讨论走向基于语料库的、可重复验证的比较研究[12]。

3.2. 关联理论与翻译

关联理论由斯珀伯与威尔逊提出,认为人类交际在本质上是一种明示-推理行为。说话人通过话语发出“明示刺激”,听话人则结合自身语境进行推理,从而理解说话人传递的意图。该过程遵循认知中的核心原则-关联原则,即任何直显交际行为都是在关联的前提下发生的[13],意味着听话人只需付出最小努力,就可获得充分的语境效果。翻译是一个涉及大脑机制的推理过程,是一种言语交际行为。根据这一原则,译者应从认知语境中推断出正确的语境预设,从原文的各个语言层次找出交际者的意图、读者期待以及话语和语境之间的最佳关联,达到交际的目的[14]。

完全忠实于原文既不可能,也非必要。译者的根本任务在于促成交际成功,因此在必要时可对信息进行增删或调整。例如,若将英文谚语“It's raining cats and dogs”直译为“天正下着猫和狗”,即便读者最终能够理解,也需要付出过多的认知努力,违背最佳关联原则。而译为“大雨倾盆”或“瓢泼大雨”,虽然损失了原有意象,但能以最小处理代价传递“雨势极大”的核心含义,符合最佳关联的要求。另一个体现最佳关联原则的例子是翻译“You are a lucky dog”这句话。若直译为“你是一条幸运的狗”,中文读者很可能会因文化差异而产生负面联想,甚至误解为侮辱,从而需要付出额外的认知努力来推测原意。而将其译为“你真幸运”或“你真是个幸运儿”,虽然舍弃了原文中“狗”这一形象,但以最直接的方式传递了“表达祝贺和羡慕”的交际意图,符合最佳关联原则,让读者以最小处理努力获得足够的语境效果。

翻译不仅是一个明示-推理过程,更是一个需要兼顾语效与省力的复杂认知活动。侯国金(2023)在此基础上整合关联理论、言语行为理论与修辞学,提出“语用修辞学翻译原则”,涵盖对原文语用修辞行为的语境关联性、信息量、信息值、得体性、礼貌性、生动性及言语行为充足性等多个维度的“洞察”与“竭力保值翻译”。以诗歌翻译为例,原文中的通感、押韵、元韵等修辞特征构成强语用标记,译者需在译文中予以等效再现,而非仅满足于语义信息的传递。这一原则可视为对关联理论“最佳关联”概念的细化与操作化。它将“最小努力获得充分语境效果”这一抽象要求,具体化为对文本标记性的逐项识别与匹配,为关联翻译理论提供了更具可操作性的实践路径[15]。

3.3. 顺应理论与翻译

比利时语用学家维索尔伦提出的语言顺应论认为,语言使用者之所以能够在语言使用过程中作出种

种恰当的选择,是因为语言具有以下三个特征:变异性、协同性和顺应性[16]。语言的变异性指语言具有一系列可供选择的可能性;语言的协同性指所有的选择都不是机械地、或严格按照形式-功能关系做出,而是在高度灵活的原则和策略的基础上完成的;语言的顺应性则指能够让语言使用者从可供选择的项目中做出灵活的变通,从而满足交际需要的特性[17]。

同一切语言交际活动一样,翻译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18]。在顺应论的框架内,翻译是一个对原语的语境和语言结构之间作出动态的顺应过程。由于人的认知结构和认知环境都是动态的,译者只能根据语言结构和语境去识别原语交际者的意图,并把它传达给译语接受者[19]。翻译没有唯一的标准答案,选择何种策略,取决于译者为了实现交际目的,而有意地顺应哪些语境因素。译者必须谙熟不同的语用原则,设法沟通语用意义的差异,填补语用意义的空缺,使交际能顺利进行[20]。

顺应论在长篇小说翻译中展现出强大的解释力。从语用综观视角考察了葛浩文英译莫言《丰乳肥臀》的翻译策略,从“意识突显”“动态顺应”“文化顺应”三个维度展开分析。研究发现,葛浩文在处理上官家七姐妹人名(来弟、招弟、领弟等)时,采用了“音译+直译”(如 Laidi “Brother Coming”)的双重策略。这一选择既顺应了原文语音形式与文化意涵,也顺应了英语读者的认知习惯,是意识高度突显下的语用顺应。此外,在处理汉语流水句(如“生完第七个女儿后,丈夫怒火万丈,扔过一根木棒槌,打破她的头”)时,葛浩文通过添加“such...that”等形合手段以及 ing 分词短语,将松散的汉语意合结构动态顺应为地道的英语形合表达,实现了句法层面的语用等效。这一研究表明,顺应论的分析框架可以从词句层面扩展至语篇与文化层面,对翻译实践具有全域性的指导意义[21]。

4. 语用翻译学的应用价值

4.1. 广告语领域

广告翻译是语用翻译的典型应用场景,因为广告的最终目的不是传递信息,而是引发购买行为,这正是一种典型的言后行为。成功的广告语翻译注重效果对等。它要求译者深刻理解广告在源语文化中的语用意图和创意精髓,并顺应目标语文化的价值观和审美习惯,进行创造性重构。

例如,可口可乐的英文广告语“Open Happiness”,其言外行为是倡导一种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将产品与快乐情感绑定。如果直译为“打开快乐”,在中文里显得生硬且缺乏感染力,因此译者顺应中文的审美和文化,翻译为“畅爽开怀”。这个译文完全摆脱了字词束缚,精准地捕捉并再现了原广告的劝服意图和积极情感,是语用翻译的典范。再如,宝马汽车的标语“The Ultimate Driving Machine”,强调其极致的驾驶体验和机械工艺。如果直译为“终极驾驶机器”,在中文语境下略显冰冷,而将“machine”顺应性地翻译为“座驾”,译为“终极驾驶座驾”。一词之变,既保留了“极致”的核心含义,又融入了中文文化中对“坐骑”“驾乘”的尊贵感,更易引发目标消费者的情感共鸣。

反之,忽视语用顺应的直译往往导致失败。一款国产洗发水品牌“拉芳”曾将其广告语“爱上拉芳”直译为“Love Lafang”。由于“Lafang”对英语消费者而言主要是一个无意义的专有名词,难以触发品牌联想的语用功能,其劝服效果势必大打折扣。

4.2. 公示语领域

“公示语”,顾名思义就是给公众在公共场合看的文字语言,具有特殊的交际功能,以及提供信息和完成指令的作用。公示语通常出现在空间有限的公共场所,读者在阅读时往往具有临时性,因此公示语的语言必须简洁明了,以便读者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了解信息[22]。公示语翻译中的语用失误,轻则造成误解尴尬,重则可能引发安全问题。语用学理论,尤其是言语行为理论,为公示语翻译提供了清晰的指导原则。翻译必须确保其“言外之力”被目标语读者准确无误地识别,并产生预期的“言后之果”。

中文公示语“闲人免进”常见于办公室、仓库等场所，其言外行为是“指令”或“禁止”，但“闲人”一词带有强烈的负面价值判断。若直译为“No Idlers”或“Idlers Keep Out”，不仅语气生硬冒犯，“idler”的指称也不准确。实际上，该标语的意图是“仅限员工/授权人员进入”。因此，顺应公示语惯例和礼貌原则，译为“Staff Only”则清晰得体地完成了交际任务。另一个典型例子是“小心碰头”。它的意图是警告路人注意低头，避免碰撞。直译为“Carefully Meet Your Head”令人啼笑皆非，而翻译为“Mind Your Head”，则能瞬间激活英语读者的相关认知语境，达到即刻警示的效果。因此，公示语翻译的关键在于译者需要抛开原文的字面形式，深入理解其警示、指示、禁止或提示的语用功能，并在目标语中寻找功能相同、使用惯例相同的表达方式。许多情况下，甚至需要完全摒弃原文，进行重构式翻译。

5. 结语

语用翻译学为翻译理论与实践提供了深刻的洞察力和实用的方法论。它强调翻译的本质是跨文化交际，要求译者不仅关注语言形式的对应，更要深入理解原文的语境和语用功能，并在译文中进行动态重构。通过言语行为理论、关联理论和顺应论的应用，译者能够在广告、公示语等实际场景中实现更有效的意义传递和功能对等。

西方学者从新的语用学理论视角探讨翻译问题，选取的理论视角较为新颖，从多模态语用学、对比语用学、跨文化语用学、文学语用学等新兴跨学科语用学视角探讨翻译问题，其研究“切入点”具有独到之处[23]。与此同时，国内学界在语用翻译的理论建构与应用拓展方面亦取得了长足进展。在理论层面，侯国金(2023)将关联理论、言语行为理论与修辞学整合为统一框架，为翻译实践中的语效对等提供了八条可操作准则；方仪力(2019)则从知识再生产视角重新审视奈达翻译思想，指出奈达的“功能对等”本质上是一种语用翻译观，这一再阐释为经典理论的当代价值提供了新的辩护[24]。在应用层面，从构式翻译的语料库研究到长篇小说的顺应论分析，语用翻译学的实证基础正逐步夯实。然而，当前研究仍存在“重关联理论、轻其他分支”“重思辨、轻实证”的结构不平衡。未来，语用翻译研究应在深耕经典理论的同时，积极拓展顺应论、模因论等非关联理论的应用空间，引入语料库、实证研究等多元方法论，并回应 AI 翻译、多模态翻译等新兴议题的语用挑战，在全球化与数字化的双重语境中推动学科的纵深发展。

参考文献

- [1] 张新红, 何自然. 语用翻译: 语用学理论在翻译中的应用[J]. 现代外语, 2001(3): 285-293.
- [2] 何自然. 我国近年来的语用学研究[J]. 现代外语, 1994(4): 12-17.
- [3] 莫爱屏. 翻译研究的语用学路径[J]. 中国外语, 2011, 8(3): 88-94.
- [4] 李占喜. 西方语用翻译研究: 述评与前瞻[J]. 上海翻译, 2015(1): 72-77.
- [5] Hatim, B. and Mason, L. (1990) *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 Longman.
- [6] 李占喜. 国内外语用翻译研究: 回顾、述评与前瞻[J]. 上海翻译, 2008(1): 20-26.
- [7] Gutt, E.A. (1991) *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xt*. Basil Black Well Inc.
- [8] 曾文雄. 语用学翻译研究与发展轨迹[J]. 长春大学学报, 2005(3): 36-39+81.
- [9] 曾文雄. 中国语用翻译研究[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5(2): 62-66.
- [10] Hickey, L. (2001) *The Pragmatics of Translation*.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11] 方荣杰, 李雯. 国内语用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1988-2020)——基于 CNKI 的文献计量分析[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3, 45(1): 91-105+128.
- [12] 王才英, 侯国金. 两大名著中“半 A 半 B”构式的语用翻译分析[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2018, 29(5): 74-79.
- [13] 陈科芳. 基于语用推理机制的翻译过程框架[J]. 中国翻译, 2010, 31(3): 12-16+95.

-
- [14] 李玉英, 彭志洪. 维索尔伦语用学理论对翻译研究的启示[J].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6): 167-170.
- [15] 侯国金. 语用修辞学翻译原则[J]. 中国翻译, 2023, 44(2): 144-151.
- [16] 宋志平. 翻译: 选择与顺应——语用顺应论视角下的翻译研究[J]. 中国翻译, 2004(2): 21-25.
- [17] 杨俊峰. 语境顺应与语用翻译[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5(11): 51-54.
- [18] 宋志平, 杨颖. 从适应性理论看翻译研究的语用取向[J]. 东北师大学报, 2004(3): 101-108.
- [19] 戈玲玲. 顺应论对翻译研究的启示——兼论语用翻译标准[J]. 外语学刊, 2002(3): 7-11.
- [20] 陈宏薇. 语用学与翻译教学[J]. 现代外语, 1995(4): 27-30+37.
- [21] 邓隽. 语用综观视域下《丰乳肥臀》英译研究[J]. 上海翻译, 2019(5): 73-77.
- [22] 王芳, 孙志祥. 从语用学角度探讨公示语的汉英翻译[J].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11(1): 344-346.
- [23] 李占喜. 国内外语用翻译研究进展(2011-2020) [J]. 上海翻译, 2023(2): 8-13.
- [24] 方仪力. 作为知识再生产考察的奈达再研究——兼评《语用翻译观: 奈达翻译思想再研究》[J]. 上海翻译, 2019(1): 85-89.